

# 中美关系

## 美专家建言拜登政府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倡议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1月7日登载该智库全球经济和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乔治·英格拉姆（George Ingram）等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让中国对其“一带一路”倡议更加负责：

首先，美国应重新领导和参与多边机构，并鼓励中国采用国际标准，使“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发展原则，使受援国真正受益。通过国际论坛和志同道合的发展伙伴，强调不透明和不负责任的做法造成的危害。

其次，优先考虑一项资金更雄厚的经济发展计划。未来四年，对经济发展项目的投入至少应占有所有援助项目的四分之一。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防止各国政府受到中国对外援助的诱惑，或者至少要求“一带一路”项目展现更多责任感和透明度，提供强大的资金是必要的。

最后，认真审查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援助方面好坏参半的记录，并保留已被证明有效的政策和项目，以确保美国应对中国对外援助模式的连贯性和整体性。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IDFC），应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资助国的发展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

## CSIS：美可借中欧签署投资协定之机重建跨大西洋合作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1月5日登载该智库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James Andrew Lewis）的文章《欧盟与

中国的投资协议是一个外交机遇》称，虽然中国和欧盟最近达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但美国不应假设欧盟会自动站在中国一边。文章认为，该协定的一些因素为拜登政府重建跨大西洋合作和制定共同的对华方针提供了机遇。

第一，如何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与欧洲交流，应成为更大的美国对自身对华政策进行再思考的一部分。欧洲人并不把中国视为军事威胁，但他们逐渐把中国视为对本国经济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如果中国遵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那么该协定将为如何改革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角色提供很好的指导。

第二，欧盟将自己定位为基本权利的仲裁者和捍卫者，这让中国成为一个尴尬的伙伴。与欧洲高管和官员的讨论显示，中国“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及其在香港和新疆的行为越来越令人不安。随着特朗普总统卸任，美国将更容易推动民主治理、基本权利和基于规则的市场等共同偏好，而这些都是中国与欧洲存在分歧的领域。

第三，由于美欧在技术层面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感，美国与欧洲新的伙伴关系不能建立在“技术联盟”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价值观的基础上。这些价值观最终可以指导双方对技术和中国采取共同的态度。

### 美学者梳理美中关系中的不变因素

《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月7日登载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ies）研究员约翰·库克森（John Cookson）的文章《美中关系中没有改变的方面》称，认识到美中关系中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方面对于美国制定负责的东亚政策至关重要。库克森认为，美中关系中以下五个方面并没有

改变：

一是中国和美国都不想侵略对方。核武器使政权更迭成为必然的灾难。尽管今天美国和中国可能意见相左，但两国的存在都没有受到威胁。这一事实应该使双方以不那么对抗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分歧。

二是中国被众多有能力的大国和限制性的地理环境包围，这使其进行领土扩张十分困难。中国周围的水域和山脉均有一定的阻碍性。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都是拥核国家。日本和韩国很富裕，随时可以增加军费开支。这些都限制了中国成为一股霸权力量，进而对西半球产生可信的威胁。

三是中国渴望贸易。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则依赖于足够安全的海运航道。因此，大多数商业航运在中国海军活动的区域都将畅通无阻。在东亚地区，中国并无军事扩张的意图，因为军事扩张并不会带来显著的收益，且需要高昂的成本。相反，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则以更低廉的成本为中国提供了更多优势。

四是外部势力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仍然无能为力。美国除了在边缘游走外，仍没有明确可行的手段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

五是台湾并非美国的盟友。华盛顿和台北之间没有正式的防务条约，因为美国认为这样的条约可能会迫使北京冒险“入侵”台湾。美国应在表面上持台湾最终能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态度，并继续向台北出售武器，增加北京“入侵”台湾的成本，以更好地维持现状。

### **美学者建议调整对华金融制裁政策**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肖特

(Jeffrey J. Schott) 近日撰文称，美国应该慎用对中国的金融制裁，因为这些制裁的连带成本会损害美国生产商、金融机构以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文章称，鉴于美国与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增加，美国官员或将加大对中国主要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金融制裁力度。但美国应该谨慎行事，避免在未对此举对美国利益和国际金融市场产生的潜在后果进行充分分析和清楚了解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

实施金融制裁应遵循一个更温和的过程，使用根据特定情况制定的“胡萝卜”和“大棒”。美国应与主要盟友加强合作，并适时妥协，以确保有效执行制裁政策。

美国官员应该谨记，制裁只是经济治国方略众多工具中的一种。美国官员不应冒着使金融市场断裂的风险加大金融制裁力度，而应使用其他战略性经济反制措施来打击不当的外国行为。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禁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和向香港居民发放签证等政策来回应中国的行为。其他措施，如资助先进微电子技术的研发，增加战略性矿物的生产和储存等，也可以借鉴历史先例。

### **戴维斯和魏玲玲撰文分析拜登对华政策前景**

《华尔街日报》记者鲍勃·戴维斯和魏玲玲 1 月 6 日撰文《拜登计划建立广泛的联盟来反击中国，这并不容易》，分析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和面临的挑战。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的目标是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对北京施加广泛压力**

随着中美关系在许多方面日益紧张，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后的目标是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对北京施加广泛压力，这与特朗普

单干的做法明显不同。

拜登认为，美国需要实施多边压力。否则，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优先进入其广阔的市场为筹码，让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竞争。拜登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称：“中国总是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中看到出口，只有关闭这些出口，你才能让中国遏制他们的贸易滥用行为。”

### 拜登的“旗舰行动”

拜登的“旗舰行动”将是他的民主峰会。该计划是效仿 2012 年奥巴马总统为限制核材料扩散而召开的核安全峰会。奥巴马的峰会邀请了中国领导人。而拜登的峰会是要排除中国和其他威权国家领导人。

拜登团队计划在技术问题上拉拢主要民主国家建立联盟。他的顾问们表示，将开发新的通讯技术以减少对华为 5G 设备的依赖。有几项提案将阻止美国、日本和荷兰公司掌握的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销往中国，以使中国半导体制造商落后几代。

在人权问题方面，拜登团队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明确表示将优先处理人权问题。特朗普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香港和其他民主问题。特朗普的继任者可以采取他没有采取过的更激进的措施，包括切断中国银行与美元的联系，或寻求将港元与美元脱钩，但这可能也会对在中国的美国金融机构造成损害。

### 潜在的阻碍

在特朗普实行了四年单边主义之后，潜在的合作伙伴可能不愿与美国签署协议以对抗中国。他们也考虑到特朗普或其他类似的政客可能会在 2024 年重获总统宝座。

西方国家也担心疏远北京及其市场。经过 7 年的谈判，欧盟于去年 12 月底与中国达成了一项双边投资协定。在协定达成前的 12 月 21 日，沙利文在一条推文中似乎承认了情况的变化：“拜

登-哈里斯政府将欢迎与我们的欧洲伙伴就我们对中国经济做法的共同担忧尽早进行磋商。”贸易专家表示，为了让欧洲国家参与进来，美国需要取消特朗普政府征收的钢铁关税。但是，让步会激怒一些行业工会及其民主党支持者。

### 关税问题

拜登必须将关税难题融入其新多边主义战略中。商业圆桌会议（美国最大的公司联合会）和其他商业集团，希望拜登利用取消关税来使中国在一些特朗普政府没有解决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包括对中国企业的补贴和国企的“掠夺性”行为。拜登团队尚未对新的谈判做出承诺。

一个问题是，拜登是否会接受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等人的呼吁，提前举行 G20 峰会。G20 将给中国一个主演的角色，还可能带来一次较早举行的“习拜会”。但前克林顿政府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警告称，不要过早举行“习拜会”。她表示，“考虑到双边、地区和全球的战略影响，这是一次复杂的行动，而不是媒体拍照的机会”。

## 美国外交

### 拜登政府如何恢复美国在海外的地位

《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1 月 3 日登载国家利益中心杰出研究员保罗·希尔 (Paul Heer) 的文章称，在美国重建自身的国际地位之前，必须先治愈自己。文章摘译如下：

恢复美国自身的团结将是恢复美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先决条件。过去十年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了严重侵蚀。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大国雄心的复活，发展中世界不断变化的权力动态以及东

西半球经济实力的整体转变，使世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美国必须认识到并适应这个新历史时期。

为了恢复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美国可能需要把眼光放得低一些。全球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平衡的改变可能降低了美国完全恢复其在 20 世纪后半叶享有的全球主导地位的机会。美国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政治挑战会减少美国可用来追求外交政策目标的资源和注意力。

美国将需要更多考虑如何使其国际目标和财力相匹配。重新评估哪些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标是真正至关重要的，哪些偏好是可以调整或妥协的。美国还应该对其面对的外部挑战进行精确的评估，而不是夸大这些挑战。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国内。美国必须先通过遏制新冠病毒疫情、恢复经济和弥合国内政治分裂来治愈自己。除非能使美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成功并具有吸引力，否则美国无法在全球竞争。

### **美学者称美应以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战略应对伊朗**

美国法律事务 (Lawfare) 网站 1 月 10 日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肯尼斯·波拉克 (Kenneth M. Pollack) 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应同时采取短期和长期互补的战略来使伊朗遵守对其核项目的限制，并为后续协议铺平道路。文章摘要如下：

首先，拜登政府需要通过谈判迅速恢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 的原始条款，并暂时搁置达成后续协议的野心。美国的首要需求是让伊朗停止并终止违反 JCPOA 的核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正在破坏该协议和更广泛的地区安全。

其次，为了与伊朗达成后续协议，拜登政府必须制造更多针

对德黑兰的杠杆。对于伊朗的强硬派来说，他们逐渐在中东占据的主导地位比繁荣的经济更宝贵。鉴于此，拜登政府唯一的现实选择是阻止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并击退德黑兰过去 12 年来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海湾地区的扩张。

最后，拜登在上任之初就应该公开重申美国对卡特主义和里根推论的承诺，保护其海湾盟友免受伊朗的地区攻势，并削弱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 美学者谈北极地区的战略稳定与竞争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1 月 6 日登载该智库核问题项目主任瑞贝卡·赫斯曼 (Rebecca Hersman) 的文章《北极地区的战略稳定和竞争》称，北极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日益上升，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战略竞争区域。文章摘要如下：

北极日益增长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促使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不断增加。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采取四种广泛的北极战略来实现其在北极地区的目标。一是直接再平衡，即美国单方面提高军事能力，用竞争的方式遏制俄罗斯的优势。二是以联盟为基础的抵消策略，即优先与北极和近北极地区的盟友合作，以抵消俄罗斯的行动。三是基于域的抵消策略，即关注北极地区的经济和资源竞争，将美国的优势最大化。四是求稳的应对策略，即在提高透明度的同时，与中俄在利益重叠的领域开展合作。

第一种方法会加剧俄罗斯的威胁意识，从而使其采取更为激进的战略。由于俄罗斯在地理上靠近北极地区，通过第三种方法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建立经济平等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因此融合基于联盟的抵消策略和求稳策略的混合战略才是最佳选择。美国可采取以下措施实现其在北极地区的目标：



第一，保持进入该地区的通道。在北极地区建设足够的基础设施，以在该地区有效运作，并提高美国调整在该地区的存在来应对未来发展的灵活度。

第二，第二，改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改善北极地区的通信和定位导航授时（PNT）需要商业和国家卫星系统之间的协调。美国应该考虑增加对高空气球的投资，并使用无人机系统在该地区巡逻。提高在该地区所有领域的的数据收集能力，包括陆地、海洋、地下和太空。

第三，强调核安全。鉴于北极地区发生核事故的风险不断增加，美国应考虑与北极国家和靠近北极的盟友进行核事故演习。这一方面能为处理核事故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能引起人们对俄罗斯在该地区可疑核活动的重视。

### **美智库：如何加强美印防务和安全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研究员约书亚·怀特（Joshua T. White）的文章称，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在持续发展后正面临诸多挑战，拜登政府应作出调整来提升美印关系。

文章认为，美国可以做更多事情来阐明其在安全问题上与印度接触的关键优先事项：第一，支持印度成长为建设性的全球领导者，并制衡中国的影响；第二，限制中国“胁迫”印度和南亚其他国家的能力；第三，降低风险，使印巴和印中危机得以缓和。

文章提出了美印六大合作重点：将与印度的防务关系置于更广泛的双边与多边架构之中；推动更全面的防务规划对话，定期评估地区威胁环境，确定能力差距，并帮助印度军队获得这些能力；审查演习，优先安排高端活动，以便与有可能受到中国不当

影响的第三国开展联合行动；持续支持高技术合作和共同发展；确认将情报共享进一步制度化的机会；深化协商，以降低在网络、空间和核领域出现的风险。

文章称，美印防务和安全关系是拜登政府更广泛的印太议程中一个相对低调但重要的部分，需要稳定的投资和重新调整，而不是大幅重新设计。

## 美专家称美需改变与中俄竞争的方式

目前美国越发倾向于通过一种结构不合理的方式来与中俄对抗，更多聚焦于最坏情况下的战争，而不是更广泛的竞争。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专家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等执笔的报告称，美国需要改变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的方式。

报告称，目前美国越发倾向于通过一种结构不合理的方式来与中俄对抗，更多聚焦于最坏情况下的战争，而不是更广泛的竞争。美国未能整合民事和军事竞争，未能解决“灰色地带”行动，未能着眼于竞争的全球性质，也未能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竞争要么不涉及直接战斗，要么只涉及低水平的战斗。美国没有适当优先考虑处理战略伙伴关系，也没有对竞争的长期模式进行综合评估。

报告强调，美国不能把重点放在与中俄的重大常规战斗或战区层面的战斗上，实际上大多数军事竞争可能发生在“灰色地带”、混合战争或非正规层面。美国必须在全球层面参与竞争，因为中俄通常会间接开展竞争，目标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这就需要美国继续在全球各地部署强大的军

力，特别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美军各司令部和主要盟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将决定美国取胜的总体模式，对威慑和防止重大冲突和核战争至关重要。

报告认为，美国需要对其竞争方式做出重大调整，不能只考虑军事竞争，也不能把战略伙伴和其他国家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若要有效地竞争，美国必须：关注中俄使用的所有民用、军事和经济“灰色地带”战术，及其对特定战略利益的累积影响；以类似于中俄和其他国家与美国及其战略伙伴竞争的方式，采取真正的全政府手段，开展联合军事和经济评估；通过处理所有“灰色地带”军事行动来应对军事竞争，并通过利用主要作战司令部为每个国家和地区制定合适的战略；将重点放在建立和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与中俄开展直接竞争的狭窄领域；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发展一个能应对所有领域竞争的综合战略。

除上述措施外，美国还必须在非机密层面上更有效地参与竞争。主要重点应当放在开源报告上，借此揭示非法或隐秘竞争，点名披露中俄官员和秘密活动，引用第三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资料，并且展示此类活动的历史记录和模式。

最后，美国需要制定计划、项目和预算，切实执行可行、成本效益高的战略，以应对中俄挑战、工业时代带来的新问题以及新冠病毒产生的持久影响。美国需要更明智地利用当前资源和盟友的最大潜力，同时充分利用民用和经济领域的国内资源。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媒称动乱和错误信息正在撕裂美国

Axios 网站 1 月 10 日载文称，美国正被动乱和大量错误信息撕裂，分裂为“蓝色美国”“红色美国”和“特朗普的美国”。

文章称，“特朗普的美国”的一些人被推特和其他一些社交媒体封了账号，他们与其他美国的联系正在被切断，正在转向地下。对共和党人抑或是所有美国人来说，存在的问题是，“特朗普的美国”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内让传统的“红色美国”黯然失色。

共和党正在分裂成两派，首先是 2016 年那些“从不支持特朗普”的人退出，四年后又有一批建制派共和党人因特朗普的选后行为而退出。尚不清楚“特朗普的美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但很明显，特朗普与其他共和党人的较量将会延续。有确凿证据表明，支持特朗普的人正蜂拥至 Newsmax 等极右翼媒体，以获取和分享强化他们观点的新闻。

与此同时，“蓝色美国”几乎在所有地区崛起：它赢得了众议院、参议院和白宫的控制权，主导着传统媒体和社交平台，掌管着大型科技公司。

### 美国面临的重大威胁来自于国内

《大西洋月刊》网站 1 月 10 日登载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艾默生·布鲁金 (Emerson T. Brooking) 等的文章称，尽管有关外国干涉的宣传不绝于耳，但美国民主面临的重大危险来自于国内。文章摘要如下：

近日暴徒对国会大厦的袭击是现代互联网的产物。强行闯入

国会的右翼极端分子沉迷于大量有关“盗窃”选举和由特朗普总统本人宣称的“深暗势力”的阴谋论。

在 2020 年大选前的几个月里，81%的美国人担心虚假信息可能会决定总统人选，75%担心外国政府可能会进行干预。但是，改变选举结果的海外行动并没有出现，但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数年来的国内虚假信息和长达数月的否认 2020 年大选合法性的运动，一起创造了愤怒和妄想的火种。

从 2016 年起，美国在信息方面最重大的威胁就是共同的美国政治现实的崩塌，而不是外部力量。解决这一问题将是拜登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尤其是若不能认识到矫枉过正和夸张的危险，应对该挑战的难度将更大。

重振本土新闻或许比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采取任何大胆行动都更能削弱外国势力和国内极端主义的影响。必须坚持美国价值观，利用美国的多样性和公民的自豪感。任何减少虚假信息吸引力的计划都必须使边缘化的社区参与进来，增强新闻的多元化。

###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分析近十年美国人口变化趋势**

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威廉·弗雷(William H. Frey) 近日撰文分析了 2020 年甚至是近十年来美国关键的人口变化趋势，主要变化如下：

一是出现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停滞。数据显示，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1 日，美国人口仅增长 0.35%，不到 2000 年水平的一半。这至少是自 1900 年以来最低的年增长率。

二是地域流动持续下降。美国人口停滞的另一个指标是人口的地域流动性低。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人口的迁徙趋势一直呈持续下降态势，当时每年约有 20%的美国人迁居。到 21

世纪初这一水平下降到 13%-14%， “大衰退”（2008 年金融危机）后进一步下降至 11%-12%， 2020 年更是创下 9.3% 的新低， 且近距离和远距离迁徙均在下降。

三是人口老龄化显著。2020 年的人口普查还将凸显美国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鸿沟急剧扩大。数据显示，2010 至 2020 年，美国 55 岁以上人口增长 27%，是 55 岁以下总体人口增长率（1.3%）的 20 倍之多。

四是白人人口首次下降。据人口普查局最新估计，2010 至 2019 年，美国白人人口小幅减少近 1.7 万人。白人人口减少是美国人口停滞的主要原因。与其他种族和族裔相比，白人人口下降主要是由于其年龄结构较老，导致相对于其人口规模，出生率更低、死亡率更高。

五是“千禧一代”和“Z 世代”的种族构成更多元。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是“千禧一代”或更年轻的世代。虽然其增长速度不如老年群体快，但他们的种族构成更多元。同时，“千禧一代”及其晚辈则出生在移民数量剧增的年代。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移民及其子女在很多方面都对美国年轻人口的增长和多样化作了贡献。

## 美学者分析如何修复美国民主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 1 月 7 日登载该智库民主、冲突和治理项目高级研究员瑞秋·克莱因菲尔德 (Rachel Kleinfeld) 的文章称，总统拒绝让出权力、其支持者使用暴力和恐吓来向政治官员施压的行为破坏了美国的民主。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正面临严重的党派分化，但这种两极化主要与政策无关。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在堕胎、移民和枪支立法等问题上的

想法类似。问题在于，美国公民越来越憎恨和害怕对方，并忠于自己的政党。这种现象被称为“情感两极化的情感部落主义”。

严重的两极化似乎预示着民主的末日。但事实上，调查发现，情感两极化在许多国家（如丹麦）更为严重，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应对疫情等方面做得更好。近年来，美国的两极分化愈发严重，但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两极化的产物。

高度两极化的政治环境孕育了第二个问题：民选的、受欢迎的党派从内部破坏民主。在高度两极化的国家，党派人士虽然也关心民主，但他们更关心自己所属的一方赢得选举。

美国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来扭转上述趋势，但多管齐下的策略可能会有所帮助。这将涉及促进新的政治结盟，加强制度和规范，并促进社会和经济层面的重新联系。

美国需要一个或多个保守党派。最近一系列激烈的选举证明，近一半的美国选民明显持有一系列值得代表的保守思想、价值观和利益。但内部改革似乎不太可能，由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小部分势力组成一个温和的中间派政党的想法似乎同样不可能。情感两极化意味着，两党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跨越界线，组建一个可行的第三党。

因此，促进新的政治结盟的最佳选择是采取某种形式的优先排序投票（ranked choice voting）。在这种投票中，选民对他们喜欢的候选人进行排序。那些得票最少的人会被淘汰，而那些给他们投票的人会看到自己的选票被投给自己所选的第二位候选人。这种投票方式可以让共和党内不同意识形态的候选人相互竞争，而又不破坏共和党赢得选举的机会。

这个选举周期揭露了一系列制度上的缺陷，包括缺乏对举报人的保护。众议院 2019 年的一项名为 H. R. 1 的法案解决了其中一些问题。加强制度还要求坚持问责制。为追求权力而触犯法律

的人应当受到惩罚。最后，国家和州的执法部门必须采取新一波行动，打击暴力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国内恐怖分子。

利用两极分化获得权力的政客只是在回应民众的需求。美国人对他人和政府的信任度几乎处于最低点。孤独和疏离导致人们在国家政治和网络运动中寻找归属感。虽然很多白人至上主义者都是可恨的，但一个致力于帮助人们远离极端组织的机构发现，寻求“与暴力极右组织接触的美国人点击心理健康广告的可能性要高出 115%”。现代生活的失范和异化需要人们做出创造性的、自下而上的努力，加强美国公民生活和社会纽带。

加强社会纽带也需要一个为更多人服务的经济体系。推动疫情后经济发展的政策至关重要，这些政策尤其要考虑没有大学学位的各种族男性以及大批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女性。这些群体的经济复苏对于民主复苏必不可少。